



我国端午节丛考

曾维华 王 冕

摘要:我国传统的端午节,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内涵丰富。然或因文献记载不足,或因对文献释读不一,诸多问题尚未圆满解决。经研究,“端午”风俗实源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之后,“五月五日”民俗活动逐步取代“夏至节”。端午节在历史上名称颇多,至唐玄宗时始有“端午”之名,既体现了先民对自然气象变化的认知,也融汇了阴阳五行的古典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端午节”适逢气象“阴阳相交”,其名也源于此意。时值天气转暖,疫病虫害流行,先民积累了多种抗御疫病虫害,保障身体健康的方法,并形成风俗。粽叶(包括芦叶、箬叶等)的选择也源于这方面的认知。在历史过程中,端午习俗又融入了祭祀地方“先贤”“英灵”的内容。粽子并非为端午节刻意所创,也不能因“角黍”之名为据说源于北方。用植物叶子包裹食材制作食品的方法,起源很早,也很普遍。粽子所用食材在我国南北方均有种植,因而尚难确定粽子始于南方或北方。粽子应是先民生活中已广泛食用的食物,并逐步成为端午节南北共同流行的特色食品。

关键词:端午节;丛考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22)01-0118-11

端午节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传统节日,或因文献记载不足,或因对文献释读不一,诸多问题已十分模糊。学界虽对端午节的起源、“端午”之名的来历等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但皆因依据有所不足,难以使人信服。因而,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研究。

一、“端午”初名及名义考释

从文献记载看,端午节在历史上先后有多种名称。除“端午”外,还包括有“夏至节”“五月五日”“浴兰节”(亦作“浴兰令节”)“仲夏端五”“天中节”(亦作“天节”“天中令节”)“地腊”“重午节”“重五节”“解粽节”“菖蒲节”“端阳”“女儿节”“午节”等。这些不同的名称,大多文献记载

明确,且无异议,但是“端五”与“端午”却有不少争议,而这些争议直接影响正确理解“端午”或“端午节”之名的由来与含义。

据文献所载,汉代至唐代之之前,即“端午”之名出现前,一般称五月五日、五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或仲夏端五、五月端五。“端午”虽本作“端五”,但“端五”仍为“初五”之意,并非特指节名。而用“端五”时,前面通常冠以“仲夏”“五月”等时节或月份为限定。自“端午”成为节名后,“端午”便取代了“端五”。晋代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五,烹鹑角黍。”^{[1]74}由于原书已佚,很多转引的书籍,亦写作“端午”。若是,此当是“端午”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不过,这里应是“端午”还是“端五”,尚有争议。有人考证,《风土记》所载当为“端五”,这是对的^{[2]376-378}。“端午”一词出现与使用则

收稿日期:2020-04-21

作者简介:曾维华,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考古与文物研究。王冕,男,上海市徐汇区图书馆馆员、采编部主任(上海 200030),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民俗文化史研究。

晚得多,直到唐代才出现,如唐玄宗李隆基《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张说《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鱼字)》、杜甫《端午日赐衣》等。

唐李匡义《资暇集》载:“端五者,案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为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3]157}李匡义是唐代晚期人,他说“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表明当时社会上已广泛使用“端午”,又说:“为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其实,这里存在一个认识错误。“端五”与“端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端五”主要是时间概念,即“初五”,而“端午”既是时间点,更是节名。李匡义所说“元和中端五诏书”,没有使用“午”字,那是对的,因为诏书所用是下诏时间。如果诏书用“午”字,就不那么确切了。由于未见李匡义所说“诏书”原文,可以认为,诏书原文在“端五”之前当有月份或时节的限定词。实际上与李匡义所说“诏书”同一时期的官府文书即有“端午”,如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敕云:“其诸道进献,除降诞、端午、冬至、元正任以上贡修其庆贺,其余杂进,除二日条所供外,一切勒停。”^{[4]546}这里是作节名使用的。因此,李匡义所说是有所不足的。

唐代以后,“端午节”也常被简称为“午日”,尤其在宋人诗文中较为多见。这些文中的“午日”,有时被人传抄成“五日”。当然,在特定的语境下,写作“五日”也不算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错误的。“午日”是“端午”的简称,即五月初五日,而“五日”则可指任何一个月的初五日。此外,如上文所述,“端午”之名在唐代及以后才普遍出现。唐以前通常以“五月五日”等日期称之,因而“午日”作为“端午”之省称,自然也是唐以后才广为使用。唐以前不应有“午日”作为“端午”的省称。如有的话,当是后世传抄之误,或未经考证而改刻的版本。如元瞿佑《四时宜忌》载:“《洛阳记》:午日造水羹艾酒。”^{[5]17}《辞源》“午日”条引该资料,认为引的是晋陆机的《洛阳记》^{[6]559}。这样,“午日”作为“端午节”的别称似乎可追溯到晋代。其实,这条记载是有问题的,并不准确。除陆机《洛阳记》外,“史载尚有杨佺期、华延俊、戴延之等所撰《洛阳记》,诸书所引《洛阳记》或不著撰者名”。今人编《陆机集校笺》“所辑录,皆注明出处。凡诸书所引

不著撰人、且无从考之为陆机撰者不录,疑似者姑录以备考”^{[7]985}。以《陆机集校笺》为代表的《陆机集》一般无此句,《四时宜忌》所引或非陆机《洛阳记》,且把“术羹”错为“水羹”。唐代《金门岁节记》载:“洛阳端午作术羹艾酒。”^{[8]61}“术”:“草名,根茎可入药。有白术、苍术等数种。”^{[6]1976}同“艾草”浸酒相对的应是用“术草”做羹。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端午节”的初名,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据《后汉书》志第五,及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可知,至迟在汉代“五月五日”已有节俗之意,成为与“夏至节”同样重要的民俗节日。

汉代为何以“五月五日”作为该民俗活动之日?当是“夏至节”原本多在五月。至于定在五月五日,或与《河图》的阳数有关。《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河图》共有10个数:1,2,3,4,5,6,7,8,9,10。其中1、3、5、7、9为阳;2、4、6、8、10为阴。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的时间多为阳数重叠组成,如一月一日为元旦,三月三日为上巳节,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七月七日为七夕节,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而阴数除了二月二日龙抬头,其他阴数重叠的日子基本上没有重要节日。而“龙抬头”作为节日,实际上至元代才有记载。元熊梦祥《析津志》载:“二月二,谓之龙抬头。”^{[9]214}当然,与阳数重叠的几个传统节日并非在一个时期产生的。

据文献记载,至少到唐代,五月五日已成为官府认可的节日。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四月《停诸节敬献诏》云:“比之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10]461}唐玄宗时,始有“端午”之名(详见下文)。宋代则有“端午节”之名,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条专门名为“端午节”^{[11]54}。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亦有“端午节”条^{[12]321}。

“端五”之名初见於晋周处的《风土记》。欧阳询《艺文类聚》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1]74}欧阳询为隋末唐初人,所引《风土记》应是可信的。这里虽已有“端五”之名,但一般在“端五”之前有月份或时节限定,如“五月”“仲夏”等,而不单独称“端五”。如果仅说“端五”,会有歧义,因每月“初五日”均可称“端五”。据《全唐文》载,唐张说《大衍历序》云:“谨以十六年八月端五。”^{[13]2270}唐张说、宋璟等

《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13]2253}以此，可认为当时每月初五日，均可称“端午”。

但是，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八月端午”载：“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唐类表》有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14]3}认为“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由于这段文字流传甚广，影响较大，不仅有论者用以为据，且一些工具书亦多有引用。

其实，《全唐文》所载是正确的，而洪迈《容斋随笔》所引文字，或是经后人改刻的版本，是错误的。“端午”一词真正出现和使用，从目前研究看，当始于唐玄宗时期。此前文献中如有“端午”，应为后世刊刻误改所致。

有人相信洪迈《容斋随笔》所引文献是正确的，便找理由，认为“端午”一名是张说等为避唐玄宗生日之讳^[15]。“唐玄宗生日是八月五日，宰相宋璟建议避讳将‘端五’改为‘端午’。”也有“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的诞辰，并设立为千秋节，而五月五日与八月五日同为五日，缘于对皇室贵族身份信息的避讳，盛唐时五月五日和‘端五’被‘端午’之名迅速取代，并成为当时主流的称呼。”^[16]以为唐玄宗生日为“八月五日”，为避“五”字，遂改“五”为“午”，完全是臆测。尽管，我国历史上避讳现象十分繁杂，但尚未见如此避讳之例。

有的不仅不解“端午”之意，甚而以为是错的。如李匡义《资暇集》载：“端午，端五者……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3]157}北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端五之号，同于重九。角黍之事，肇于风俗……后世以‘五’字为‘午’，则误矣。”^{[17]971}

有的不解“午”的含意，以“五”“午”相通释之。北宋黄朝英在《湘素杂记》中，对李匡义《资暇集》中的那段文字评议说：“余案，宗懔《荆楚岁时记》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鹑角黍。’乃直用午字，与济翁所载不同。以余意测之，五与午字皆通，盖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于理。”^{[18]207}

据文献记载看，唐玄宗之前，对“五月初五日”的称呼，一般作五月初五日、五月初五、五月五日、仲夏端五等。至于说“仲夏端午”是不准确

的，是后人误改。那么“端午”之名始于何时呢？唐玄宗有《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端午》（一作《端午武成殿宴群臣》），张说有《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鱼字）》，其中均有“端午”一词。这是所见最早使用“端午”一词的资料。有学者考证，唐玄宗《端午》诗作于“开元十五年”^{[19]621}。若此不误，那么“端午”一词最早不晚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此后，唐代文献便频现“端午”一词，如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太常博士独孤及上表曰：“初，代宗时。每岁端午及降诞日四方贡献者数千，悉入内库。”^{[4]543}穆宗长庆三年（823年）三月丁巳，“敕应御服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歙等道合供进者，并端午、诞节常例进献者一切权停”^{[20]502}。此外，唐代也有以“端午”作诗者，如殷尧藩有《端午日》诗^{[21]卷四百九十二.5567}。

尽管“端午”之名在唐玄宗时已出现，并在以后的官府文书中屡有使用。但是，与上文所论李匡义类似，唐代后期以及宋代，仍有人不明“端午”其义。其实，唐玄宗用“端午”一词，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这主要是后人对“端五”“端午”的释义缺乏探究，遂引发种种臆测。

关于“端”。《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在“端月”下唐司马贞《索隐》云：“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讳‘正’，故云‘端月’也。”^{[22]卷十六.766}《说文解字》云：“端，直也。”^{[23]216上栏}《广雅·释詁》云：“端……正也。”^{[24]11下栏}《大广益会玉篇》云：“端，绪也，直也。”^{[25]51}又云：“绪，丝端也。”^{[25]124}《太平御览》引《风土记》：“仲夏端五。端，初也。”^{[26]146}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京师市廛人，以五月初一日为端一，初二日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27]309}据此可知，“端”的释义有正、直、初、开始等。

关于“五”。“五”作为数序第五是没有问题的。此外，还有其他释义。“五”，小篆写作“五”。《说文解字》云：“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23]307下栏}

关于“午”。《史记·律书》云：“午者，阴阳交，故曰午。”^{[22]1247}《说文解字》云：“午，铎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又“铎，逆也”^{[23]311上栏}。

据“端”“五”“午”释义看，“端五”释作“初五”最为合理。尽管“五”有“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之意，但主要侧重于道教阴阳五行的理解。在人们生活中，一般是将“端五”之“五”作为数序使用

的。而且使用“端五”时,前面均有“仲夏”“五月”等限定。而“端午”主要是指气象“阴阳相交”之始。其实,我国很早就将“仲夏之月”(即五月)作为“阴阳相交”的时节。《礼记·月令》载:仲夏之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郑玄注云:“争者,阳方盛,阴欲起也。分,犹半也。”^[28]¹³⁷⁰上栏因而可认为,“端午”之名,是沿用了“五月初五日”的时间点,更融入了“阴阳相交”的节气变化内容。

我国很早就用天干地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天干10个,地支12个,两者配合使用。从纪月情况看,因地支是12个,与12个月相合。《史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22]¹²⁵⁸而“秦以建亥之月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为朝贺”^[22]²³⁸。这就是说,夏人以一月岁首,建寅;殷人以十二月为岁首,建丑;周人以十一月为岁首,建子;秦代以十月为岁首,建亥。这样,无论是建寅、建丑、建子,还是建亥,每月的地支是不变的。地支的“午”月仍是“午”月。自汉武帝改用夏正以后,历代一般只改年号而不改正朔,所以“午月”基本上都是“五月”。秦汉以后,仅武则天和太平天国时期曾改正朔。民国时虽采用西方历法,但传统节日的日子,通常以夏历为基础而定。

干支纪日与纪月则不同。尽管干支相配也是60一个轮回,但大月30天,小月29天,其间还有闰月,因而地支的“午日”不会固定在某月某天。一个月中会有2天或3天逢“午日”,但不一定是“五月五日”。

由此,一般所说“五月初五日”“五月初五”“五月五日”“五月端五”“仲夏初五”“仲夏端五”等,由于“五日”“初五”“端五”前面均有月份限定,因而不会有歧义。

“端五”之“五”,通常是作数序用,即“初五”,凡月之初五均可称“端五”。而“端午”则不同,是指“阴阳相交”,气象变化的节点。尽管“五月初五”“仲夏端五”等也是指气象变化的时间点,但两者着眼点不同。一是注重时间点,一是注重气象交替节点,具有唯一性。因此,在“端午”前不必加“五月”“仲夏”等限定词。至于古人认为“端午”为气象“阴阳相交”是否具有科学性,尚待进一步研究,至少古人是这么认为的。

“端午”之名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不会产生歧义。若用“端五”,因每月“五日”均

可称“端五”,且需用“五月”“仲夏”予以限定。即使如此,也只是表达一个普通日期。而“端午”则不同,标志该节日有了专属名称。

阴阳之意古已有之,但尚属比较偏狭的。否则唐宋那么多文人不会不理解。那么,为何这个比较偏狭的意思,能在唐代兴起?当是受到道教的影响。

阴阳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之一。从流传的典籍看,最早承载这种思想的代表是《易经》。商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即已有之,春秋战国时又融入儒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子之学中,甚至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也饱含有阴阳思想。但将阴阳之学贯彻始终,最具广泛影响的无疑是道教的传播。道教经典在阐述修道之方时,均是以“阴阳”为本。而道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相比仅在少数中上层流行的王官之学、诸子之学来说,无疑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深入人心。

在唐代,道教的影响达到了高峰。625年,唐高祖李渊即下诏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29]²²⁵。至唐玄宗时,更是推崇道教,不仅给老子封“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高上大道尽阙玄元皇帝”等尊号,还把自己与李林甫的石像置于玄元皇帝庙老子雕像两侧,以示天子、宰相为教主侍从,提升老子名望。他还下令,在长安、洛阳设玄学博士和助教,各招学生一百人,专习《道德经》《华严经》等,并定期考试。因而,“端午”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并逐渐普及也属正常。“端午”之名既体现了古人对自然气象变化的认知,也融入了阴阳五行的古典哲学思想。

二、“端午”风俗厘析

我国传统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在历史传承过程中,糅合了不同地域的风俗,日益丰富。

(一)名人祭祀。

现今民俗在端午节多为祭祀屈原,甚至被称为屈原节、诗人节。其实历史上,各地曾有不同的名人祭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1.纪念战国楚人屈原。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后遭子兰等人排挤被流放。相传当楚国郢都沦陷后,于五月五日,抱石投汨罗江而亡。端午节祭祀屈原,最早可见史料是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其

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26]146}后人遂以此认为端午节源自祭祀屈原。其实,端午节和屈原的关联在隋代已有人提出异议。隋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云:“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原沉汨罗之日,并揖拯之。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春秋考异邮》云:夏至水泉跃。或因开怀娱目,乘水临风,为一时下为之赏,非必拯溺。”^{[30]240-241}认为竞渡是夏至节的娱乐活动,未必为打捞投江的屈原。即使最早记载屈原说的《续齐谐记》,也不是将此说作为确切的起源。《续齐谐记》是刘宋时东阳无疑的《齐谐记》之续,书名“齐谐”源自《庄子·逍遥游》中“齐谐者,志怪者也”之意。这仅是神话志怪集,作者将此说收入其中,并非信以为真。同样,《荆楚岁时记》所载五月五日的风俗,与屈原没有任何关系。现今,学界基本已无人认同此说。

2. 纪念伍子胥或曹娥。伍子胥是春秋楚国人,后为吴国大夫,一度助吴成为强国。后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其自尽。曹娥是东汉会稽上虞人,著名孝女。最早可查资料是三国邯郸淳的《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抚节按歌,婆婆乐神。汉安三年五月时迎伍君(即伍子胥)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31]418}此载是五月,尚未与端午节直接相联。《后汉书》载:“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汜涛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尸骸。”^{[32]2794}曹娥思念父亲,自投江,“经五日,抱父尸出”,将迎婆婆神的时间具体到了“五月五日”。

3. 纪念春秋晋国介子推。《太平御览》引《琴操》曰:“介子绥割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26]147}以为纪念。

4. 纪念东汉陈临。《太平御览》引三国谢承《后汉书》曰:“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临征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26]146}北齐魏收《五日》诗曰:“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33]1446-1447}

5. 纪念东汉马援。马援为东汉开国功臣之一,著名军事家,官至伏波将军。湖南《辰溪县

志》载:“乡民以初五日为小端午,十五日为大端午,相传其俗自汉伏波始。”^{[34]607}

可见,历史上不少地方都曾以本地名人作为纪念对象。显然,先有“五月五日”节俗,后有不同名人附会。名人纪念丰富了“五月五日”节俗活动,成为后来端午节民俗活动的一部分。

(二) 龙图腾祭祀

端午民俗有一重要活动是划龙舟,即龙舟竞渡,甚至端午节的英文译名就是龙舟节(Dragon Boat Festival)。

相传龙舟竞渡源于屈原。但是,上引隋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对此已有异议。关于竞渡的起源,说法颇多,除纪念屈原外,还有纪念伍子胥的,亦有说是源自越王勾践的^{[35]48, [36]406}。闻一多认为:“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37]238}其实,竞渡起源相当古老,原始社会既已有之。考古工作者在钱塘江南岸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距今约7000-8000年前的独木舟^[38],在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多支木桨^{[39]145-149}。先民长期在水上以舟楫从事捕捞活动,或作为运输、交通工具,此外,互相进行追逐、竞渡娱乐也自然。因此,竞渡的时间,原本不一定限于端午节。《清嘉录》案曰:“《旧唐书·杜亚传》:‘江南之俗,有竞渡之戏……’然皆在春中,不在端阳。或曰‘五日竞渡,相传吊三闾大夫而作’,本《荆楚岁时记》之说;但于吴地无涉。赵晔《吴越春秋》以为起于勾践,盖悯子胥之忠而作。周栎园《因树屋书影》以为习水报吴,托于嬉戏……然则荆楚自为灵均,吴越自为子胥耳。”^{[40]167-168}尽管“赛龙舟”起源的说法不一,但不影响“龙舟节”作为端午节的别称。

相较于屈原说,闻一多提出的龙图腾祭祀说,近世较为流行。闻一多所撰《端午考》列了101条有关典籍,认为端午是“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37]227}。闻一多所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吃粽子和龙舟竞渡两个最重要的端午节节俗活动,都和龙有关;二是端午节“五彩丝系臂”习俗,是吴越百姓“断发文身”“以像龙子”习俗的遗迹。

龙舟竞渡、五彩丝系臂习俗,或多或少源自于南方龙图腾祭祀,或产生于更为古老的先民生活与劳作之中,而现已成为较为普遍的节俗。

(三)恶月风俗

农历五月,正是疫病流行时节,俗称“恶月”“毒月”“凶月”等。所以,“百事多禁焉”。汉应劭《风俗通》载:“五月到官,至免不迁。”^{[41]253}《北齐书》载:“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42]379}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俗讳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见影,魂当去。”^{[43]430}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榻,名之曰‘恶五月’。”又载:“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44]43}

而五月五日,更是“恶月恶日”。有关五月五日止恶防毒的记载颇多。至晚在周代,已有用兰草浸水沐浴,以清洁禳毒的习俗。《大戴礼》曰:“五月……蓄兰,为沐浴也。”^{[45]53}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茱萸,弥牟[朴]盥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茱萸,言气交也。(注云:‘茱萸者,交易,阴阳代兴者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32]3122}说明汉代“五月五日”的风俗来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日。“五月五日”即“端午”之日。西晋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26]146}说明早期,“五月五日”与“夏至”虽时间略有不同,但民俗与夏至日同样受重视,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并没有五月初五吃粽子习俗,而是夏至节吃粽子,其云:“夏至节日,食粽。”^{[35]52}隋杜台卿《玉烛宝典》所载,竞渡也是夏至节的民俗活动。以此可知,汉代于“五月五日”对夏商周三代的“夏至”风俗“兼用之”,亦可说是传承了三代的习俗。因而,有学者认为“端午节”源自三代的“夏至节”是有依据的。

由于五月五日本是防病毒的日子,但因这一段时日,疫病流行,为先民所忌惮,于是逐渐将这些时日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演化成不祥之日。《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35]43}以致这一天出生的孩子都遭人厌恶,甚至被父母遗弃。《史记》载:“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文顿首,因曰:‘君所

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司马贞索隐引《风俗通》曰:“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22]2352-2353}这种恶俗,不仅存在于春秋战国,至魏晋仍然流行。有关记载颇多,不再一一列举。

在防恶月的同时,不只产生一些厌恶情绪,也衍生出互赠五彩丝、长命缕等辟邪之物,以及踏百草、划龙舟等祛病健身活动。《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是日,竞渡,竞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夏至节日,食粽。《风俗通》:‘獬豸食楝。’蛟龙畏楝。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辟水厄。士女或取楝叶插头。彩丝系臂,谓为长命缕。”^{[35]44-52}可以说,“恶月”习俗当是端午最早的核心节俗之一。

五月五日还有一个重要习俗,即吃粽子。以植物叶子包裹食材制作食品,在世界各地很普遍,而我国先民选用菰叶(茭白叶)、芦苇叶、箬叶等,与艾草、菖蒲、雄黄等类似,具有驱疫、辟邪、解毒、清热、消肿等功效。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菰……功效利大小便,止热痢,除目黄,止渴,肠胃痼热。外敷治蛇伤、疮毒^{[46]1364}。箬,功效主治咽喉疼痛,月经不止,肠风便血,妇女吹乳等^{[46]1000}。芦,功效主治骨蒸肺痿,心隔气滞,烦闷不下食,反胃上气,吐血不止,肺壅咳嗽,微热,背疮溃烂,中鱼、蟹毒,以及诸般血病^{[46]1001}。

此外,菰叶(茭白叶)、芦苇还有其他效用和喻义。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云:“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茱萸,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茱萸,传曰:‘萸萸有丛。’《吕氏春秋》:‘汤始得伊尹,祓之于庙,薰以萸萸。’《周礼》:‘卿大夫之子名曰门子。’《论语》:‘谁能出不由户?’故用萸者,欲人子孙蕃殖,不失其类,有如萸萸。茱萸者,阴阳代兴也。”^{[47]306-307}以此可知,在古人的观念与习俗中,五月五日用茱萸悬挂于门,有御凶辟邪,祈求子孙繁衍之效用,而“茱萸”又有“阴阳代

兴”之喻义。这里所载“苇茭”现在一般释作苇索,即用苇草编成的绳索。但是,“苇茭”一词并未在他处明确以绳索之意使用过。而苇和茭常在诗词中并用。唐温庭筠《酬友人》:“坐久茭荷发,钓阑茭苇深。”^[48]⁶¹《本草纲目·草部·菰》载:“江南人呼菰为茭,以其根交结也。”^[46]¹³⁶⁵“茭”符合“气交”之意。而那时包裹粽子的植物叶子用的也是芦苇和菰叶(茭白叶)。《风俗通义》所载习俗,并非还原神话场景,而是“饰桃人”象征桃树下的神荼兄弟,悬挂苇茭象征苇索。《续汉书·礼仪志》记载,夏用苇茭,商用螺首,周用桃梗,汉用朱索、五色印。不能因为汉代用朱索做门饰,就认为夏用的苇茭也是绳索。从记载看,夏商周用的都是较原始的自然物,而汉是一种继承发展,并非完全照搬。汉代把夏代的苇茭、商的螺首和周的桃梗变化成了朱索和五色印,从原始的自然物演化成了专门制作的节俗用品。这些习俗,当是现今端午挂菖蒲熏艾草习俗的本源。

这些习俗的形成与人们生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端午时节,即农历“五月初五日”,阳历六月份。因时节变化,天气渐暖,雨水频繁,万物生长,各种病疫增多。再者,那时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现今不同。古时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或土坯茅草房。这种建筑,室内近地,大多卑湿,防水防潮功能差,江南地区更是如此。值此时节,“五毒”滋生,各种虫害活动频繁。这些都会影响、侵害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古人为了适应环境需要,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多种驱除虫害,抵御病疫,以保障身体健康,祈求子孙繁衍的方法与措施,逐渐凝结为一种习俗。从文献记载看,这种习俗很早已形成,历代相承,十分清晰。尽管随着生活环境改善,科学进步,人们不再视五月为恶月。但是,仍有以熏艾草、挂菖蒲、佩香囊、用雄黄画额、饮雄黄酒、裹食粽子等方式,驱毒辟邪、防疫祛病、祈求平安。可以说,这些都是五月五日(“恶月”)习俗的遗存。

三、“粽子”源流探究

古老的端午节,历经千年传承,民俗活动不断丰富,衍生出许多习俗。各地有多种习俗,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划龙舟并不是普遍的活动。而拴五色线、饮雄黄酒、用雄黄画额、佩香囊、熏艾

草、挂菖蒲等已日渐式微。唯有粽子经久不衰。因此,尽管端午节在国际上的英文名是“龙舟节”。但两者相较,中国民众或更喜爱“粽子节”之名。

粽子,古时又称“糗”“角黍”“筒粽”等。粽子的起源也扑朔迷离。现在流传下来的说法甚多,其中有一定影响的大致有六种。

(一)祭屈原说

最早的文献记载源自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其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取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君常见祭甚诚,但常年所遗,俱为蛟龙所窃。今君惠,可以练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谨依旨。今世人五日作粽,并带练叶及五彩丝,皆汨罗之遗风。”^[26]³⁸⁰⁴隋杜公瞻针对《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下注云:“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又在“夏至节日,食粽”下注云:“屈原以夏至赴湘流,百姓竞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又以獬廌食楝,将以言其志。”^[35]⁴⁷⁻⁵²因五月五日与夏至节俗类似,均为端午的早期名称。故文献记载屈原祭日,也有夏至和五月五日两说。

(二)祭天神说

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载:“京师人自五月初一日,家家以团粽……祭天者,以五日。古词云:角黍厅前祭天神。妆成异果。”^[27]³⁰⁹《岁时杂记》为北宋吕希哲所著,记载北宋节俗,现已无存本,仅散见于其他文献中。

(三)祭獬廌说

南宋罗愿《尔雅翼》卷九“楝”注:“宗懔引《风俗通》,以为‘獬廌食楝’,原将以信其志也。”^[49]³³⁷同书卷十八“廌”注:“《荆楚岁时记》称,屈原以夏至日赴湘流,百姓竞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又以獬廌食楝,将以信其志。”^[49]⁴⁰³獬廌,即獬豸,为先秦楚人崇拜的一种独角神兽,传说能辨曲直,是勇猛、公正的象征。人们用食物祭屈原,常为蛟龙所食,而蛟龙惮五色丝和楝叶,遂用此二物裹之。同时,因“獬豸”食楝叶,可谓一举两得。以此又有祭獬豸说。

(四)祭祖说

晋人范汪《祠制》云:“仲夏荐角黍料。”^[26]³⁸⁰⁴这里“荐”是指进献祭品。粽子的“粽”与祖宗的

“宗”同音,当有以“米”祭祖之意(详见下文)。

(五)龙崇拜说

闻一多在《端午考》^{[37] 221-238}《端午的历史教育》^{[37] 239-244}等文中认为端午是龙的节日。粽子投水为蛟龙所窃。所以,端午食用粽子与龙崇拜密不可分。

(六)汝颍作粽说

明张岱《夜航船》载:“汝颍作粽。”^{[50] 474}关于汝颍史载不详,有说是汉代人,也有说是南梁吴均《续齐谐记》所记的区回。

以上六种说法,其中(一)、(六)明显有误。

关于第(一)种说法,上文已论及端午节起源与屈原无涉,自然粽子也非因屈原而创。据上引《续齐谐记》所述,最初楚人是以竹筒贮米投水祭屈原,后用“练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缚之”,防止蛟龙窃食。对此记载,有人以为是用楝树叶取代竹筒,以彩丝缠缚之。其实,原文说的很清楚,是用楝树叶裹塞竹筒一头,再以彩丝缚住,以防脱落。《荆楚岁时记》有更明确记载:“夏至节日,食粽。《风俗通》:‘獬豸食楝。’蛟龙畏楝。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辟水厄。”^{[35] 52}虽也叫粽子,但与端午节广为食用的粽子不同,不是常见的粽子的本源。

关于第(六)种说法,可信度极低。据《夜航船》所载原文,张岱将民间大多饮食的创造均附会于黄帝、神农、成汤、禹、周公、汉高祖、唐太宗等历史名人,甚至还包括有巢氏、燧人氏等传说中的人物。显然汝颍作粽并非信史。

关于粽子,虽然最早可见文献是汉代的《说文解字》,其云:“糉,芦叶裹米也。”^{[23] 148}上栏但是,糉(粽子)从实物出现、普及,再抽象为文字符号,并被广泛认同、使用,当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人们食用糉(粽子)应远早于汉代。《荆楚岁时记》云:“夏至节日,食粽。”夏商周三代,“夏至节”已成民俗节日,很可能那时已食用粽子。粽子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夏商之前的先民当具备这种能力。因此,所谓汝颍发明粽子,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据。

第(二)至第(五)种说法,概言之,只是祭祀行为。无论是祭神或神兽,本质都是祭祀神灵,趋利避灾的活动。端午风俗源远流长,传播广泛,自然会融合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文化,但作为祭祀活动已基本成为共识。目前有不少人认

为粽子的起源与祭祀的牛角有关,粽子古称“角黍”,即是对牛角形状的模拟^{[51] 76-77}。此说似已渐成通行的说法。其实存在不少问题。从历史上看,很多节俗食品都非因节俗而创制,通常是先有食品,然后为节俗所用。同理,“角黍”(粽子)也应是先民生活中已食用的食物,并逐步成为端午节的特色食品,而不是为端午节刻意创造的。

再则,“角黍”之名最早见于晋代周处《风土记》,其云:“仲夏端五,烹鹑角黍。”而更早的汉代《说文解字》已有“糉”字,其云:“糉,芦叶裹米也。”这里把“粽子”的特征说得很清楚。从“糉”字的形声义看,亦具“粽子”的特点。糉,从米从𩚑。“𩚑”,《说文解字》云:“𩚑,敛足也。鹄鸕醜其飞也。”^{[23] 112}下栏其意为鸟飞时将腿爪敛起聚拢。“糉”当为会意字,即将米聚拢用芦叶包裹起来之意。

南梁顾野王编《大广益会玉篇》载:“糉,芦叶裹米。”与《说文解字》同。又载:“粽。同上,俗。”^{[25] 75}以此可知,“粽”字是后起之字,在南朝梁时,“粽”尚属“俗”字。根据我国汉字六书的特点,“粽”应属形声字。“米”是形,“宗”虽为声,当有借用先祖(祖宗)之意,可释为以芦叶裹米祭“祖(宗)”。可见,把粽子用作祭品,或是后来衍生的作用,并非因祭祀而产生。

再说,因“角黍”之名有一“角”字,而认为是仿祭祀用的牛角是不足取的。“角”在古时也并非专指“牛角”。许慎《说文解字》云:“角,兽角也。”^{[23] 93}下栏《大广益会玉篇》载:“角,兽头上骨出外也。”^{[25] 122}那是泛指动物的角,可以是牛角,也可是羊角、鹿角。其实,用植物叶子包裹食材最简易的包扎方式都会产生角状。因而,包裹粽子,产生棱角,名称中带有角字是很自然的。汉刘熙《释名·释饮食》针对当时“饼”的不同名称,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蒸饼、汤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52] 135-136}这是很有见地的。其实,不仅是“饼”,其他食品亦都“随形而名之”。如饺子(馄饨),初名即因其形而称为“角子”^{[53] 325}。粽子发展到现在,包括世界各地的类似“粽子”食品,形状很多,有正三角形、尖三角形、正四角形、长方形等,却鲜见有圆球形的。

至于“角黍”的“黍”,很多人认为其中包裹的是黍类,即今北方多有种植、食用的黄米。黄米,性黏,多用作蒸糕,类似南方的糯米。以此,有人据西晋才出现的“角黍”记载,便认为最初的粽子

所裹的是黍类,粽子也被认为源自北方,“粽子最早里面包裹的不是糯米,而是生于北方的黍。也就是说,粽子的起源应是在中国的北方,而且至少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主要是作为祭祀品,在日常生活中食用的并不多”^[54]。

据上引资料,“角黍”一词最初见于西晋的《风土记》,而更早的汉代《说文解字》对“糗”的解释是:“糗,芦叶裹米也。”^{[23]148上栏}并没有说用什么米。实际上,《风土记》所载也没限定用黍。《太平御览》引《风土记》曰:“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一名糗,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像也。”^{[26]3804}这里说用的是黍米。但《太平御览》在另一处引《风土记》云:“仲夏端五……又以菰叶裹粘米、粟、枣,以灰汁煮令熟。”^{[26]146}这里就没说用的是黍米。其他文献或写“黍米”,或写“粘米”“黏米”。其实,第一条引文或有误。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引《风土记》云:“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1]74}欧阳询为隋末唐初人,所引《风土记》当更为可信。第一段引文“黍”或为“黏”字之误。周处生于236年,正值三国割据到晋统一时期。自汉献帝即位以来,中原战乱,至晋统一,长达近百年。而黍为北方作物,这百年间,南方几不可得。而南方盛产稻,后世糯米粽子几乎完全盖过了黄米粽子。因此,当时既然有种植糯稻,不可能没人用糯米做粽子。尽管民间有“南稻北麦”的俗语,实际上北方也一直种稻。《诗·周颂·丰年》载:“丰年多黍多稌……为酒为醴,烝畀祖妣。”^{[55]909}古代黄河流域称稻为“稌”,而那时的稌或稻,主要是指糯稻。《诗经》中《小雅·甫田》《唐风·鸛羽》《豳风·七月》《小雅·白华》《鲁颂·閟宫》等有许多咏稻稌的诗句^[56]。《后汉书·张堪传》载,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即今北京地区推广种植水稻,“开稻田八千余顷”^{[32]1100}。只是稻在北方与南方相比,种植面积小,产量相对低,价格一定不菲。孔子曾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57]486}春秋时,由于北方稻少价高,自然是以黍类为主。而南方盛产稻,必然多用糯米。《风土记》所记是阳羨地区的风俗。阳羨位于江南盛产稻米地区,粽子更应用糯稻,而非黄米。

另外,《说文解字》云:“黍,禾属而黏者也。”^{[23]146下栏}晋崔豹《古今注·草木》亦云:“稻之

黏者为秠。禾之黏者为黍,亦谓之稌,亦曰黄黍。”^{[58]15}(按《古今注》“校勘记”卷下第23条云:“秠”,三本作“黍”,下有“亦谓稌为黍”五字。稻也为禾属,不改为“秠”,原本写作“黍”也并无不可。)可见,包括稻在内所有黏性的米,在广义上均可称黍。也就是说,古时“黍”并非专指黄米。因此,《太平御览》引《风土记》所载的“黍米”,即使不是“黏”字之误,其表达的意思仍是黏米。“角黍”之名,从文献记载看出于“糗”之后,《风土记》亦是“糗”之名置于“角黍”之前。“糗”比“角黍”之名更早,或是“粽子”的初名,后以民间俗字“粽”流传至今。

因此,以“角黍”之名,说粽子源于北方是有问题的。不过,说粽子源于南方也无确证。上文已指出,祭祀屈原是“竹筒贮米”。这种做法,与有些地方竹筒饭相似,并非现在通常粽子的源头。

粽子所裹的黏米种类并无限定,可用黄米也可用糯米,包裹用的植物叶子《说文解字》说是用芦叶,《风土记》记载是菰叶,而芦叶、菰叶是南北均有生长的植物叶子。因此,“糗”是南北方百姓都可制作的食物,并没有确凿的资料证明是源于北方或南方。

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包裹粽子使用的植物叶子,主要有芦叶、练叶(或作楝叶)、菰叶、箬叶等。最早记载粽子的汉代《说文解字》云:“糗,芦叶裹米也。”^{[23]148下栏}说是用芦叶。《风土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一名糗,一名角黍。”^{[26]3804}说是用“菰叶”。清袁枚《随园食单》载:“洪府制粽……用大箬叶裹之。”^{[59]249}说是用大箬叶。对这些叶子,一般都笼统地称“粽叶”。现在通行的粽叶,北方多为芦苇叶,南方多用箬竹叶。箬竹叶简称箬叶,与百合科植物一叶兰的别名相同,常相混淆,箬叶也常被错写成箬叶。这也只是大体上的划分。由于长江以北基本不生长箬竹,自然不太会用箬叶。但是像河南等地区亦有产竹区,也会用竹叶包粽子。而南方很多地区也生长有芦苇,故也用芦苇叶做粽叶。

我国古代先民并不是简单地使用芦叶、菰叶、箬叶等包裹粽子,而是在生活实践中,因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御疫辟邪文化观念支配的选择。芦叶、菰叶、箬叶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而芦苇兼具御疫辟邪的作用,菰叶(即茭白叶)则有阴阳相交,阴阳代兴喻

意,以祈求身体健康、子孙繁衍兴旺。再有,《风俗通》所载,先民用“楝叶”“五彩缕”缚于筒粽上投于江中,主要是在人们观念中“蛟龙畏楝”,可“辟水厄”;“士女或取楝叶插头,彩丝系臂,谓之长命缕”,可祈求健康长寿。

至晚到宋代,粽子的品种已颇为繁多,不限于包裹黄米、糯米。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有“栗粽”^{[60] 282},苏东坡诗句里有“杨梅粽”^{[61] 2490}等。时至今日,粽子所裹食材更是丰富多样。不过,使用芦叶、箬叶包裹的传统一直未变。

结 语

综上所述,端午节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据文献所载,其风俗源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汉代于“五月五日”融合了夏商周的“夏至节”风俗,成为与“夏至节”并重的节日。之后,“五月五日”民俗活动日益兴盛,逐步取代“夏至节”,成为这一习俗的主要活动日。端午节在历史上名称颇多,至唐代玄宗时始有“端午”之名。“端午”之名既体现了先民对自然气象变化的认知,也融汇了阴阳五行的古典哲学思想。“端午”作为节名出现后,一直相沿未改,流传至今。

端午节适逢气象“阴阳相交”,天气转暖,疫病虫害流行。先民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多种抗御疫病虫害、保障身体健康的方法与经验。如挂菖蒲、佩香囊、熏艾草、以雄黄画额、采草药泡水沐浴,以芦叶、菰叶、箬叶裹食粽子等。以驱秽辟邪,禳疫除病,消杀虫害,沐浴清污,并形成风俗。从某种意义上说,端午节是先民在节气变化,阴阳转换时,实行驱毒除秽,防疫辟邪,以祈求保障身体健康,子孙繁衍昌盛的活动节日。之后,又融入了祭祀地方具有浓郁爱国情怀、民族气节的“先贤”“英灵”等活动。

用植物叶子包裹食材制作食品的方法,起源很早,也很普遍。粽子所用食材主要是糯米、黄米,而糯米在我国南北方均有种植,因而难以确定粽子始于南方或北方。粽子见于文献最早称“糗”,后有“角黍”“筒粽”“粽子”之名。我国先民选用芦叶、菰叶、箬叶,或楝叶包裹粽子,是基于对自然环境、气象变化的认知,以及文化观念基础上的选择。“粽子”在漫长的民俗活动中,历千百年传承,不仅成为端午节的美食,而且融入了祭

祀的文化内容,是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升华。

参考文献

- [1]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2] 张勃.唐代节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3] 李匡义.资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4] 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5] 瞿佑.四时宜忌[M]//丛书集成初编:第133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 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7] 杨明.陆机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8] 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9] 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10]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11]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M]//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9.
- [12] 西湖老人.繁胜录[M]//全宋笔记:第八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
- [13] 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五“张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4] 洪迈.容斋随笔:卷第一“八月端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5] 宋亦萧,刘琴.端午节俗起源新探[J].中原文化研究,2016(2):55-60.
- [16] 陈雨舟.唐前端午节俗中的人文精神[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46-50.
- [17] 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14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8] 黄朝英.湘素杂记:卷五[M]//全宋笔记:第三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19]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 [20]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1]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3]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4] 广雅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5] 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6] 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7]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M]//续修四库全书:第8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8]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9]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M]//续修四库全书:第12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30]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五[M]//丛书集成初编:第133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1]施宿等.会稽志:卷二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32]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3]佚名.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四[M],扬州:广陵书社,2008.
- [34]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 [35]宗懔.荆楚岁时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8.
- [36]顾起元.说略:卷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37]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 [38]蒋萍,郑蔚.跨湖桥划来世界最早独木舟[N].文汇报,2013-11-20(10).
-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40]顾禄.清嘉录[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 [41]马总.意林:卷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42]李百药.北齐书:卷四十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43]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44]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M]//燕京岁时记外六种.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
- [45]孔广深.大戴礼记补注: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46]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 [47]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
- [48]温庭筠著,曾益笺注.温飞卿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9]罗愿.尔雅翼:卷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50]张岱.夜航船:卷十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 [51]王仁兴.中国年节食俗[M].北京:北京旅游出版社,1987.
- [52]刘熙.释名·释饮食: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53]曾维华,窦葳.饺子与馄饨源流考辨[M]//中国古史与名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54]何宏.粽子起源考证[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6):1-5.
- [55]毛亨.毛诗注疏:卷二十七[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56]游修龄.糯米饮食文化圈的兴衰[J].饮食文化研究,2006(3):3-9.
- [57]孔丘.论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58]崔豹.古今注[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59]袁枚.随园食单[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7.
- [60]吴自牧.梦粱录[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
- [61]苏轼.皇太后阁六首[M]//苏轼诗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China

Ze Weihua and Wang Mian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Festival has a stream long history,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rich contents. However, many problems have not been solved satisfactorily because of lack of historical document o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document. From research, the custom of “Dragon Boat Festival”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Summer Solstice Festival”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periods. After that, the folk activities of May 5th gradually replaced “Summer Solstice Festival”. There are many names for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history. The name of “Duan Wu” appeared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Dynasty. It include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not only reflects the ancient people’s cognition of meteorological changes, but also merges with classical thought of Yin Yang and Wu Xing. “Dragon Boat Festival” coincides with the meteorology of interlocking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name of “Duan Wu” also comes from this meaning. It was that weather became warmer and diseases and pests were prevalent, ancient people accumulated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resist diseases and pests to keep healthy, and then formed customs. The choice of Zongye (including reed leaf, indocalamus leaf, etc.) also comes from this cognition. The custom merged with the contents of “Sages” and “Heroes” in the sacrificial place as well. Neither Zongzi was specially created for “Dragon Boat Festival”, nor it was said to come from the north because of its name “Jiao Shu”. The method of making food by wrapping ingredients with plant leaves originated very early and is so common. The ingredients of Zongzi are planted both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so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Zongzi originated in the south or north. Zongzi should have been widely eaten in the life of ancient people, and gradually become common popular special food of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Key words: Dragon Boat Festival; textual research

[责任编辑/周舟]